

2702

重庆文史资料

第三十九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文史资料

第三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 编 徐朝鉴

副主编 李宗杰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三十九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编
重 庆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市嘉陵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0

字数 175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一版 199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 S B N 7—5621—0806—4/K·41

定价：3.00 元

编辑说明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民族的危亡和同仇敌忾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荟萃于大后方的文化界人士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忱。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与落后现象等等，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一件件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一个个抗日文化机构如雨后天春笋般地产生与发展。

本辑选用以亲历、亲见、亲闻为主的史料20多篇，记述了当年在陪都重庆从事各项文化工作与活动的老一辈文化界人士的不朽业绩。同时，也汇集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界史料，供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研究和参考。

当然，抗战文化的范畴甚广，内容颇多，一本篇幅有限的史料很难系统深刻地反映，有待史学界和其他方面人士进一步补充完善。

在本辑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重庆文化志编辑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朱龙渊、石曼、邓菱等同志为此多方奔走，在组稿和撰稿方面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使本辑得以顺利编成，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者

目 录

我在重庆的音乐生活	赵 泓 (1)
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	伍雍谊 (7)
苦难的历程	席明真 (14)
《雾重庆》在重庆	宋 时 (23)
《北京人》重庆首演纪事	曹树钧 (28)
老舍在重庆的创作生涯	杨耀健 (36)
难忘的江村	王东生 (40)
柯璜与金润民	胡昌健 (55)
杂技教练杨宝忠	朱龙渊 (58)
我在重庆的木刻生活	王 琦 (61)
国立剧专在四川的抗日救亡活动	康世明 (68)
重庆戏剧对抗战的贡献	吕贤汶 (83)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出版物	石 曼 (96)
抗战时期重庆通俗文艺活动	熊 炬 (109)
川剧改良运动概述	胡 度 (122)
抗战时期川剧改革论谈	段 明 (131)
厉家班在重庆	张 力 (140)

毛主席在渝所看之京剧	文 志 (157)
一个没有建成的剧场	吴新稼 (161)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史话	陈 铎 (171)
北碚民众图书馆	周昌溶 (181)
抗战烽火中的重庆大学	伍子玉 (187)
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琐忆	李光岱 (201)
张俶知与勉仁中学	黎 炎 (209)
兼中“突兀文艺社”活动及其影响	文中六 (213)
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	甘文峰 (220)
学者张圣奘	黄振富 (224)
文场十咏	
——为新加坡刘情玉女士作	凌文远 (231)

我在重庆的音乐生活

赵 沅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党的南方局在这里，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直接领导重庆文化工作，把文化界广大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虽然许多机构是国民党的，但做实际工作的却是我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如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是国民党的人，而实际管事的有受我党影响进步人士应云卫，我党老同志阳翰笙是厂的艺术委员会主任。这些官办文化机构有我党的组织、党员，但一般是通过进步人士执行党的指示。不能认为在国民党机构工作的人全是在为国民党做事。

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为扩大文艺界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他要求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交友是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采取的必要的特殊方式，周恩来自己就结交了许多文艺界朋友。有时他去看朋友，有时又请朋友上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来。他还经常利用公开场合接见许多人，利用请吃饭的机会讲形势。赵丹未去新疆之前，被请去周公馆吃饭，被请的还有张瑞芳、白杨等影剧界朋友，我也去了；有时他还亲自做菜招待客人。许多文艺界进步朋友把去周公馆看作是唯一能够找到真理，找到真正出路的地方。

那时文艺界的党员不多，除南方局、办事处公开工作人员外，都是地下党员，音乐界有李凌和我。以后又有夏白。后来我们地

下党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广交朋友，把文艺界赞成抗日、赞成民主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党领导的进步文艺运动在国统区便始终占着主导地位，重庆便成了国统区文化运动中心。

1939年夏，国民党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反共浪潮逐渐上升，进步学生和教师被捕的事也发生了。周恩来这时不在重庆，具体联系我的是南方局文委的张颖，我与杨慧琳也联系过。李凌在重庆也由她们联系。环境恶化后，地下党员与上级联系要按规定预先约好，我们要见张颖得先到新华日报门市部留条子。那时我们很年轻，有一次，我们把包着纸条的大铜板往门市部柜台里面扔去，张颖批评说太莽撞了，扔铜板的声音很响，会引起国民党便衣特务的注意。她教我们见着新华日报的人在门市部，便将包着小石头的条子或夹着条子的书，往那人面前一放，便立即走开。

重庆的环境逐渐恶化，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密切注视着文艺界朋友的情况。对名望高的郭沫若、阳翰笙等，估计国民党不敢轻率逮捕他们，可以留下坚持工作。能在重庆站得住脚的同志就留下继续工作，不能留下的就撤退、转移。皖南事变发生后，大批进步文化人撤离去香港、缅甸，有的去了延安。这次大撤退的计划，很周密很具体，周恩来对每个人走的路线、方式都作了精心安排。

周总理的群众威望很高，他记忆力过人，能记住许多人的姓名、工作、生活情况，而且很清楚，和他初次见面就会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信任他。1939年夏初，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就像老友重逢，不用我说他就知道我住在南岸玄坛庙，在中央电影摄影场（“中电”）工作。他向我了解罗学谦（“中电”场长）对我的看法。我说，罗学谦知道我有技术，“中电”没有人搞音乐，制作电影新闻纪录片全靠我配音，他要利用我的技术，至少目前还离不

开我，还打算让我当音乐组长。“中电”当时拍摄的电影主要是新闻纪录片，如每月新闻、抗战新闻、前线战况等等；所谓陪都的一些活动，如英国大使呈递国书等情况，都要靠我搞成新闻纪录片配上音乐。后来，让我代理新闻组组长。原来的组长在汪精卫叛逃后去了上海。

我还向他汇报了斯大林派了摄影师卡尔曼到我国战地拍了许多片子，毛片我看过，拍得好极了，技术上、选材上都高过我们。周恩来说：趁这个机会替他编一编，可以在国内放。我接受了他的指示，编了部电影，最初起名《四分之一的人类》，后改名《四万万同胞》，最后定名为《抗战到底》。电影送审，罗学谦这一级都通过了，张道藩、陈立夫不准上演。因为片子反映解放区，反映感人的军民关系的镜头太多。这部电影不是由我编出来就完了，还要洗、印、剪接、配音，还要许多人做工作才能完成。卡尔曼虽然是斯大林派来的，但苏联是与国民党联系的，与我们没有关系。卡尔曼拍的片子副本，是苏联塔斯社代表罗果夫应“中电”的要求送来的，副本还要重新打样制作，我能看到，我报告了周恩来，他指示我编成电影。这种灵活机动的作法，便是国民党机构为我们工作的一个实例。

我代理新闻组长，还可以给去延安的人开路条。几个青年想去延安抗大、陕公念书，我就给他们开个“中电”记者证，上西北战地采访，盖上国民党“中电”的大印就可以通行。有个青年是李凌的亲戚，就这样到延安参加了革命，“文革”中让我写证明，要我交待开“中电”记者证给他的经过。我说：我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大堆护照和记者证，只要没有人，我就可以开给他，这又是一个利用国民党机构为我们做事的例子。

“中电”的工作是我的社会职业。

周恩来和南方局文委领导我在重庆进行的主要工作，是编《新音乐》月刊。抗日歌咏活动从1938年初开展以来，已经两年了，随着歌咏活动的普遍发展，大众迫切需要音乐刊物。李凌和我主编的《新音乐》月刊便于1940年1月在重庆创刊。刊物出版后，大受欢迎，很快突破33000份，超过了当时重庆出版的所有期刊。我们按照党的指示，通过刊物组织了“新音乐社”，吸收国统区各地歌咏负责人参加，进一步推动国统区歌咏活动深入发展。那时，李凌和我还要做好社会职业，站稳脚跟。我们一边教书一边编刊物，刊物还是在桂林印；还要作“新音乐社”的工作。李凌住在上清寺，我住在南岸，每个星期六，我就在李凌家住一宿，星期天抱一大堆信件回南岸去处理。就我们两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办的刊物能够突破33000份，是很不简单的，我们受到周恩来的表扬和鼓励。

《新音乐》月刊受群众欢迎，主要是解放区创作的大量新歌，如吕骥的《大丹河》等进步歌曲通过它介绍给了国统区广大读者。周恩来常往返渝、延间，给音刊带来新歌，其他同志也带歌来。歌源丰富音刊就能办好，我们有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同志作靠山，这是音刊办得好的根本原因。皖南事变后，《新音乐》被封，我们油印出版过华南版。“新音乐社”的内部联系也用油印，没有油印机，凭蜡纸、橡皮刮印也能出内部刊物，通报消息，解决学习疑难。

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重庆首次公开演出，是在国际反侵略分会等八个团体举行的联合晚会上，由业余合唱团演出的。国民党把我们演唱《黄河大合唱》视作洪水猛兽。据说在延安的一次演唱会上，国民党的一位将军被《黄河大合唱》开始时的一声“咳嘴”吓得跳了起来。1939年5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第一次演出之后，就开始在国统区传唱，这年秋天，在国统区

出版了单行本。业余合唱团早就想唱《黄河大合唱》，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直到1940年10月才得到练唱的机会，我每周去和他们排练，最多一周三次，排练了两个多月，12月15日才有机会参加这次公开演出。周恩来为防备意外，出席晚会时穿着国民党将军中校的制服。这次演出，我独唱了《黄河颂》，光未然担任朗诵。

我在重庆教唱过抗日歌曲的社团很多。南岸的中央警官学校合唱团，是东北流亡学生组织的，受的虽是警官训练、特务训练，但是他们思念家乡，有挽救民族危亡的热情，最爱唱《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该校校长王士珍应合唱团的要求，邀请我去教歌。青年合唱团是基督教信徒组织的，我是通过李公朴先生去教唱抗日歌曲的。中苏文协俄文夜校合唱团请我去教歌，是因我懂俄语，能够用俄语教唱苏联歌曲。苏联电影《夜莺曲》、《夏伯阳》、《大马戏团》等通过苏联代表罗果夫介绍到中国来后，我看电影时记下《夜莺曲》谱，歌词仍用俄语教唱，这只歌很快就在国统区流传开来。《夜莺曲》是一支非常优美动听的俄罗斯民歌风格的抒情歌曲，很受学生欢迎。

我在两三所中学教过音乐，加拿大人文幼章请我去教书的事很有意思。精益中学在南岸，那里可租马骑，一天，我正在马背上高歌，被文幼章听见了，他用四川话来跟我搭腔，了解我的情况，后来便邀请我去精益中学教书。我还介绍了三个人去工作，其中的方殷就是在精益中学教书时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教师、诗人，后来，被营救出来了。在教会学校，我不教圣歌，只教欧洲古典歌曲家舒伯特的曲子，文幼章听了很高兴。他不在时，我就教学生唱抗日歌曲，通过教歌与学生们熟悉之后，就成立读书会读《新华日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时事研究会也召开了，名为研究时事，实为座谈抗战形势，讨论汪精卫叛逃后中国

走什么道路，宣传解放区战场，宣传抗战到底。那时，所有进步合唱团没有不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的。国统区的学生运动就是这样通过地下党员进行活动，逐步发展起来的。

1937年至1940年底，我在重庆接触音乐界的重要活动有三件：第一、《黄河大合唱》的首次演出，已在前面说过；第二、中苏文协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举办的演唱会上，我与盛家伦合唱了《囚徒歌》；第三、郭沫若用文工会名义举办星期文艺讲演会，参加者很踊跃，国泰大戏院坐满了人，沙坪坝穷学生天不亮就动身，走路来到会场。茅盾讲文学，洪深讲戏剧，贺绿汀和我讲音乐。此外，我还参加过文工会诗歌小组举办的诗歌朗诵，高兰、光未然都是热心分子，我在中央大学用德语朗诵过海涅的诗。

我是皖南事变后离开重庆的。我向周恩来要求上延安，他不同意，说大后方需要人。后来，周恩来决定我与李凌、光未然、徐迈进等一同到昆明，然后去缅甸，他还亲笔写信，请他在昆明的友人对我们予以照顾。张颖将他的安排详细地告诉了我们，要我们小心谨慎，特别是我这个抛头露面较多的人，经过巴县一品场国民党检查站时，一定要伪装像是去南温泉游玩回来的人，避免引起特务注意。我们按照周恩来的指引，安全抵达了昆明，后经畹町到了缅甸首都仰光。以后，我到过香港、上海，直到全国解放，再也没有来过重庆。但是，李凌和我主编的《新音乐》，更名为《音乐艺术》后，仍然在重庆出刊，直到抗战胜利。

（邓菱整理）

国立音乐院的“山歌社”

伍雍谊

在重庆市远郊青木关隘口旁的山坡上，1940年9月建立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建校初期，与林荫深处飘摇而出的叮咚琴声相伴的，是宁静而沉闷的校园生活气氛。

1942年至1944年，相继有一批经过艰苦生活磨炼的，或有抗日救亡音乐工作经历的青年学生投考入学。他们都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倾向，在入校学习以后，在校内逐步开展了争取民主进步的活动，使当时这一最高音乐艺术学府的校园生活活跃起来。

学生们的民主活动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就是学术性学生社团的出现。1944年上半年，理论作曲组1947级（即1947年毕业的班级）的同学潘名挥、朱石林、谢功成、郭乃安、伍雍谊、王震亚、孟文涛、严良堃、华蔚芳、伦宝珊组成了“理论作曲组1947级级会”。这是国立音乐院第一个学生社团组织，他们最初的活动，主要是共同探讨音乐学习上的问题。同时在校内出版墙报，发表自己的艺术见解。后来，由于探索创造有民族特色的音乐的共同愿望，并且在延安开展的民歌运动的影响之下，他们决定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歌的工作。

经过一阶段收集、整理和编选的工作，他们于1945年3月5日出版了《中国民歌》（油印简谱本）第一辑。这本民歌集共辑入新疆、青海、内蒙等地区的民歌124首。国立音乐院民族音乐学

科的教授杨荫浏先生对这一工作给予热情支持，并为这本民歌集写了序言。文中对同学们搜集、研究民歌的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的努力将会结成有益的果实。编者也为该集子的出版写了自序。序文中阐明了他们从事这一工作的目的：“第一是改造民歌。无可讳言的，民歌的作者缺乏技巧的训练，有的不免粗糙，有的不免流于低级趣味。我们想试着将它们再加一番洗炼，使它们从自身的艺术上提高起来。第二是由民歌的研究着手而创造出民族的音乐。民歌既然是人民生活的产物，那它的节奏、旋律等都与人民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创造真正反映人民生活的音乐，便要去研究民歌的旋律、节奏和调式的规律，并且从旋律中去寻求一些可能的和声体系。我们以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寻找到一条创作真正民族音乐的道路。”

《中国民歌》出版以后，编者们在校内公开征求为民歌配钢琴伴奏及改编为重唱或合唱形式的作品。这项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包括理论作曲组 1947 级在内的作曲专业和非作曲专业的一批学生，以及作曲学科教授陈田鹤，都拿出了他们编配民歌的作品。1945 年 4 月 23 日，即《中国民歌》出版一个半月之后，在国立音乐院礼堂举行了一次民歌演唱专场音乐会。

这次民歌演唱会在校内外的反应相当强烈。在第二天举行的座谈会上，师生们除对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之外，都一致肯定了这一活动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积极意义。陈田鹤说，搜集到的民歌还是“死的东西”，“到昨天的演唱，算是把它弄活了”。杨荫浏认为：“这是提高民族音乐最快的一条路。”并说：“我对民歌运动的希望很大……我可以说它相当于北京大学的文化运动。”在谈到配伴奏的体会时，伍雍谊说：“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有参考，也不可能模仿，几乎都是根据自己的想象，从

曲调上来寻找它的节奏与和声。”陈田鹤也说：“我们要求和声与曲调配合。至于如何才好，是个创作问题……最好是亲自到该地，领受它（指民歌）的印象，使感觉与音响结合起来。”大家还对编配中运用四度和声、副七和弦、对位技法等的得失及民歌调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演唱方面，也曾就“唱民歌应否用西洋发声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伍正谦（声乐教授）说：“什么是西洋唱法，什么是中国发声法，我觉得是不应分开的。”他认为“唱民歌应想到如何更自然、更正确，不一定要用特别的唱法。也许可应用几种不同的音色”。武隽达觉得“主要是吐字和表情的适应”。叶理平也认为“声音方面主要是自然，注意感情表现，声音技巧是其次”。黄凛说，她自己在演唱时“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咬字准确，在吐字上需要夸大一些；一是情感方面，目前我们不可能身历其境去体验，我是从曲调里去体味的。更多地了解词意会更好一些”。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成为民歌编配的创作问题和民歌演唱问题的学术研究的发端。

接着，又以国立音乐院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名义在青木关民众教育馆举行了公开演出的民歌演唱会。

民歌研究、演唱活动对于在青木关关口外璧山县松林岗的国立音乐院分院（即抗战后建立的“国立上海音专”的前身），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里的同学也进行了搜集民歌的活动，并在1946年4月27日晚举行了他们自己编配的民歌的演唱会。他们还编印（油印）了一本名为《雨不洒花花不红》的简谱民歌集。

在编印出版《中国民歌》和组织艺术加工、演唱活动的同时，理论作曲组1947级级会于1945年3月12日出版了墙报《山歌》，发表有关民歌研究的文章，宣传他们的艺术观点。通过搜集、研

究、演唱民歌的活动，一批艺术观点比较接近的同学聚集在一起了。为了更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民歌活动，1946年3月31日成立了“山歌社”，其成员有国立音乐院内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同学共40多人。会上选举出理事11人：郭乃安（任理事长）、屠咸若（负责总务部）、张文纲（负责研究部）、严良堃（负责出版部）、储声虹（负责演出部）、黄凇（负责函授部）、叶传瀚（负责服务部）、朱石林、谢功成、潘名挥、王震亚；候补理事黄克、文彦两人。会上通过的社章中明确地表达了山歌社的宗旨：“本社以集体方式来搜集及整理本国音乐，介绍及吸收西洋音乐，普及音乐教育，提高音乐水准，以达到建立民族音乐之目的。”

山歌社成立后不久，为了反映民歌运动的情况以及联系离校的社友，于同年5月间出版了《山歌通讯》（油印），第一期上一篇题为《迎接“五四”》的文章中说：“我们……当前唯一的课题是怎样学习‘五四’的精神，把音乐工作配合到争取民主团结和平建设的现实上去。因为，我们在今天要求的还是和‘五四’当时所要求的一样，只不过内容广泛了和具体了罢了。”这可以说是对山歌社宗旨的一种补充。在《山歌通讯》第一期上，还转载了吕骥在延安发表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这一事实，表明了山歌社开展的民歌运动和延安的民歌运动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山歌通讯》随着社友离校进入社会工作岗位及后来国立音乐院迁南京，曾先后出过渝版、遵义版、南京版和香港版共约20期，直到1949年初才停刊。它发挥了沟通信息、联系社友以及反映国立音乐院学生运动情况的作用。

山歌社成立以后，为了满足校内外的演唱者的需要，于1946年6月4日出版了带钢琴伴奏谱的五线谱本《中国民歌选》（油印本）第一辑，其中选刊了民歌21首，暂时解决了民歌演唱者们的

迫切需要。后来到 1947 年，由郭乃安负责编辑，在油印五线谱本《中国民歌选》的基础上经过精选，并增加了江定仙教授编配而经常演唱的《康定情歌》，共 14 首歌曲，由上海的中华乐学社出版了铅印本《中国民歌选》。江定仙教授还为这本歌集写了序言，这是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史上第一本经过艺术加工的有钢琴伴奏的铅印五线谱本民歌集。

1946 年 1 月间，由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建议，重庆进步文化界人士为 1945 年 10 月 30 日在苏联逝世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举行纪念音乐会。国立音乐院的进步学生联合校内一部分声乐专业的学生，组成演出队，担任了《黄河大合唱》及冼星海的其他一些合唱、独唱作品的演出（音乐会的另一部分节目由育才学校音乐组担任）。张文纲负责组织、联络工作，严良堃担任合唱指挥。演出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后来成立的山歌社和中国音乐社两学生社团的成员。

冼星海纪念音乐会于 1946 年 1 月 5 日晚在重庆七星岗江苏同乡会礼堂举行。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郭沫若、陶行知、李公朴、邓初民、沈钧儒、黄齐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出席了纪念音乐会。周恩来在会上简略介绍了冼星海的生平和他为人民、为祖国所做出的贡献，并就当前的时局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冼星海作品的演出也很成功，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这次纪念音乐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音乐和文化领域，而成为一次具有鲜明政治意义的活动。音乐会原定连演两晚，后来由于国民党当局害怕它的影响扩大，强迫江苏同乡会取消了 1 月 6 日晚的租约，因而只演了一场。在重庆的音乐文化活动史上，这是一次值得载入史册的音乐会。

在山歌社成立以后，他们更积极地迈出校门，到社会大舞台